

试论隋代前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兼评隋文帝“不悦儒术”说

张先昌 许 瑛

(江苏大学, 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 隋代前期的文教政策与相关制度建设, 建树丰硕且影响深远。从制度层面讲, 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国子学的独立; 专科学校书、算学的创办; 有关业务部门设博士招收学生进行职业性训练等, 均由隋开其端并形成制度, 对唐、宋及以后王朝产生重大的影响; 从社会政治层面讲, 该政策培养了大批的治国人才, 树立了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气, 传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 奠定了此后的治国方向, 为隋代政治、经济的发展, 提供了思想文化方面的保证。

关键词: 隋代前期; 隋文帝; 文化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09)09-124-127

开皇元年(581), 北周外戚杨坚通过宫廷政变建立隋王朝, 立即废除北周尚武、尚贵戚及蔑视文人的传统, 把兴教为先、崇尚文治作为建立强盛统一帝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隋代前期为隋文帝杨坚统治时期(公元 581—604 年)。隋朝结束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后, 在推进政治与经济统一的同时, 还要求实现更加深层的文化统一, 形成有利于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 以便使新政权获得稳固的基础。可是, 长期分裂造成的道德沦丧、骨肉相残和个人对社会的离心意识, 使得文化重建的任务艰巨而复杂。以隋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 用兼容并包的胸襟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从而使文化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功。

1 用诏书的形式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 把劝学行礼作为易风移俗、教化民众、改革社会政治、治理国家的基础。开皇三年(583)诏曰:

建国重道, 莫先于学, 尊主庇民, 莫先于礼……古人之学, 且耕且养。今者民非役之日, 农亩时候之余, 若敦以学业, 劝以经礼, 自可家慕大道, 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 识廉耻, 父慈子孝, 兄恭弟顺者乎? 始自京师, 爰及州郡, 宜祇朕意, 劝学行礼。^①

开皇九年(589)隋平陈后, 又下诏: “今率土大同, 含生遂性, 太平之法, 方可流行。凡我臣僚, 澡身浴德, 开通耳目, 宜从兹始……内外职位, 遐迩黎人, 家家自修, 人人克念……代路既夷, 群方无事, 武力之子, 俱可学文, 人间甲仗, 悉皆除毁。有功之臣, 降情文艺, 家门子侄, 各守一经, 令海内翕然, 高山仰止。”^② 这是实现全国统一之后,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 国家由重视武功向文治转变的重要法令, 它标志着治理国家的基本国策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开皇十八年七月, 诏“京官五品已上, 总管、刺史, 以志行修谨、清

作者简介: 张先昌, 江苏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许瑛, 江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平干济二科举人”，这是隋政权大力崇文兴教的又一政策法规，影响中国封建时代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诞生。仁寿元年(601)诏曰：“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伫贤隩之人。”像这样的诏书一直到仁寿四年(604)隋文帝临死之前还在颁发，唯恐学风不盛，儒学不昌。

2 建学校，招生徒，大力兴办教育事业。隋文帝统治时期，国家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和专科学校书学、算学等。国子学招收学生140人、太学360人、四门学360人、书学40人、算学80人。中央开风气，地方起而效之，各州县均设有政府开办的学校，学校体系已初步形成。邺都自北齐灭亡后，世家大族多迁至长安，“唯技巧、商贩及杂户之家移实州郭。”梁彦光任相州刺史，见当地人情险薄，欺诈成风，下决心革除其弊，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进行教育，于是出资延聘“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令有闻者，升堂设饌，其余并坐廊下。”^③大儒何妥为龙州刺史，“有负笈游学者，妥皆为讲说教授之。”^④当时的学校已普及到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如令狐熙任桂林总管十七州诸军事时，“开设学校，华夷感敬，称为大化。”^⑤

隋文帝对文化教育重视的另一表现是，极力抬高孔子及其后代的社会地位。隋学制规定，每岁以四月“释奠于先圣先师”，封孔子后裔为“邹国公”。

隋文帝经常巡视学校，亲听讲授。对学习成绩优异、表现突出的学生，“颁赐各有差”。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总结，给予解决。“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学校未能培养出优秀的拔尖人才，他认为这是“教训不笃，课课未精”之故，下令“明勒所由”，立即改变。除官方开办学校弘扬儒学外，他还支持私学和家学的发展。山东马光“教授瀛、博间，门徒千数”，文帝诏其入朝，门徒又“多负笈从入长安”。刘焯“优游乡里，专以教授著述为务，孜孜不

倦……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⑥

西汉时期，儒家经典被钦定为“经”，于是有了经学，从此以后，经学一直是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主流。魏晋南北朝虽玄学、佛教、道教盛行于世，先后成为显学，但在学术上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太学生修习的科目仍是儒家经典，经学的研究不但没有中断，而且形成了南北学术的不同风格。

隋实现南北统一，君主专制体制也要求意识形态、学术思想的统一，南北经学的合流成为时代的要求。隋文帝对学术的贡献之一是由政府出面组织对儒学、佛经的学术论辩。通过辩论既可识别人才优劣，又可把儒学研究引向深入，还可消除歧见，统一思想，这比以行政手段强求学术思想统一要高明得多。隋文帝提倡儒学名士在一起讨论学术，一人主讲，众人发难，辩疑解惑。有时他还亲自参加。如马光入京不久，文帝亲幸国子学，召集王公以下聆听讲论，“诸儒生以次论难者十余人，皆当时硕学，光剖析疑滞，虽辞非俊辨，而理义弘贍，论者莫测其浅深。”^⑦元善讲孝经，文帝亲临释奠，诸儒毕集，元善敷陈义理，何妥引古今疑义提问诘难，如此，对于统一歧义滋生的南北经学，效果极佳，也使治国伦理得以阐述透彻，优良学风得到发扬。

3 重用名儒硕学。文帝令州县搜罗贤哲，“皆取明知古今，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在用人上唯恐“闾阎秀异之士，乡曲博雅之儒”，被“遗弃于草野，堙灭而无闻”。^⑧文帝广泛“引致天下名儒硕学之士”，亲召山东六儒马光、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和刘祖仁等六人至京，皆“授太学博士”。开皇九年(589)，隋灭陈后，“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⑨不少人充实到中央部、寺或学术机构任职，没有到京城的学者亦多任地方教官，如吴郡的潘徽，“及陈灭，为州博士”，^⑩就是一例。

在中央三省六部实权部门也用了大批儒学名士。如任命元善为内史侍郎。辛彦之，拜为太常少卿，进位上开府，官至礼部尚书。刘焯和刘炫常

置于门下省决策。隋文帝信任的大臣许多是当时的名儒或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人。如身兼五职的宠臣苏威,号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李德林年十五能诵五经及古今文集,以儒学称著于时,“声名籍甚,无竞一时”,任命为内史令。人称“关西孔子”的薛道衡,被任命为内史侍郎。牛弘以儒学大家历仕文、炀二帝,任秘书监、礼部、刑部尚书等职,始终得到信任和重用。

4 改革学术教育管理机构。开皇初年,学校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为国子寺,隶属于太常寺。国子寺设祭酒一人,属官有主簿、录事各一人。统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各置博士、助教、学生等员。随着学校体系的形成和教育的长足发展,文帝于开皇十三年(593)将“国子寺罢隶太常,又改寺为学”。^⑩这一改革把学术教育机关从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太常寺下解放出来,自成系统,国子祭酒成为国家最高的教育行政长官,从而改变了自汉代以后数百年由宗教统辖学术教育的传统,有利于学术的独立和学校教育的发展。

5 大量搜集整理儒家经典。整理图书文籍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适应大一统政治形势,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战乱给学术文化载体的图书文化事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开皇初,秘书监牛弘在给文帝的表文中讲述中国图书先后遭受秦始皇焚书、“五胡乱华”和萧绎自焚图籍等厄运。隋朝建立时,总共才有图书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与梁朝图书旧目相比,仅有其半。因此,他大声疾呼:“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⑪

为此,文帝广求遗书,整理图籍,不遗余力。虽然当时百废待兴,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文帝还是痛下决心,批准牛弘的请求。诏遣使者分赴各地,用高价收购天下图书异本,献书一卷,酬缣一匹。秘书省校写完毕后,再将书籍归还原主。当时,均田制下的农民每户每年向国家交纳的调绢为一匹,也就是说,国家以一户农民一年的调来购求一卷书,可见文帝对搜访图籍的高度重视,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重赏之下,民间收藏的

珍本异书纷纷呈献出来。隋灭陈后,宰相、元帥府长史高颎与记室裴矩收陈朝所藏图籍,尽数运回长安。至此,图书流散于南北各地的局面终告结束,国家掌握的图籍大大增加。^⑫

作为主持图书整理工作的国家机构——秘书省,文帝时置“监、丞各一人,郎四人,校书郎十二人,正字四人,录事二人。领著作、太史二曹。著作曹,置郎二人,佐郎八人,校书郎、正字各二人。太史曹,置令、丞各二人,司历二人,监候四人。其历、天文、漏刻、视祲,各有博士及生员”。^⑬博士是专家,生员是学生兼助手,其他则是官员和办事人员。作为朝廷主管文化事业的机构,秘书省除管理图书外,还主管修史、天文、历法等。开皇十三年(593)五月,隋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藏否人物者,皆令禁绝。”禁绝民间修史及广求天下遗书,并由官方统一整理、修撰史书,都是旨在加强思想文化统一的重大举措。

在此基础上,隋朝在宫内和秘书省建立起国家图书馆,对搜集到的图书进行整理分类。儒家经典有:《易》类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尚书》类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诗》类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礼》类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乐》类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春秋》类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孝经》类十八部,六十三卷;《论语》类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加上其他方面的经籍达三万余卷。隋以前国家存书“合一万五千余卷”,现在是以前的一倍有余。^⑭为了对这些图书进行整理保存,隋文帝“召天下工书之士”,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补充秘书内外之阁。同时,隋文帝还提倡私人著述立说,只要不涉及国史和品评人物,政府并不加以禁止,所以新书问世不断。如何妥撰《周易讲疏》十三卷,《孝经议疏》三卷,《庄子议疏》三卷;刘炫著《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与此“并行于世”者不胜枚举。

在文帝文治政策的积极推动下,隋朝的文教事业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唐朝魏征曾

给予很高的评价:

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贵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⑩

文帝大力提倡文教,拿出很多钱来办教育,取得很大的成就。然而,学生的懒散、不求进取,“徒有名录,空度岁时”,让他非常失望。在文帝看来,20年来学校既没有培养出“德为代范”的楷模,也没有培养出他所期望的治国人才,仁寿元年(601)六月,“于是国子学唯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⑪文帝罢废学校是为了提高生徒质量,减少国家的经费开支,这种过激行为,虽然造成人才培养上的一定损失,但时间较短,仅三年半时间,影响有限,所以,我们不能因此就给其扣上“不悦儒术”、“不敦诗书”的帽子,更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其文教政策。炀帝即位后,纠正其父文帝之失,于大业元年(605)在全国范围恢复了学校,“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⑫

在隋文帝统治的前20年,他始终把恢复和发扬儒学作为己任,“缀往圣之旧章,兴先王之茂则”,“制礼作乐”,“不敢宁息”,“删正彝典,日不暇给”,^⑬为发展繁荣儒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之,隋代前期的文教政策与相关制度建设,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其建树丰硕且影响深远。从制度层面讲,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国子学的独立;专科学校书、算学的创办;有关业务部门设博士招

收学生,进行职业性训练等,均由隋开其端并形成制度,对唐、宋及以后王朝产生重大的影响;从社会政治层面讲,隋代前期的文教政策,培养了大批的治国人才,树立了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气,传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奠定了此后的治国方向,为隋代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文化方面的保证。可以说,隋唐帝国的出现有其深厚的文化基础。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充分肯定隋代前期的文教政策并对其作出新的科学的评价。

[江苏大学人文社科重点建设项目(JDR2006A04)的阶段性成果。]

注:

①《隋书》卷47《柳机附柳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

②《隋书》卷2《高祖纪下》。以下引文未出注者均同此。

③《隋书》卷73《梁彦光传》。

④《隋书》卷75《何妥》。

⑤《隋书》卷56《令狐熙传》。

⑥《隋书》卷75《儒林传》各本传。

⑦《隋书》卷75《马光传》。

⑧《隋书》卷1《高祖纪上》。

⑨《隋书》卷21《天文志下》。

⑩《隋书》卷76《潘徽传》。

⑪《隋书》卷28《百官志下》。

⑫《隋书》卷49《牛弘传》。

⑬韩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

⑭《隋书》卷28《百官志下》。

⑮《隋书》卷32《经籍志一》。

⑯《隋书》卷75《儒林传》序论。

⑰《隋书》卷2《高祖纪下》;而《隋书》卷75《儒林传》序和《刘炫传》均为“七十二人”。

⑱《隋书》卷75《儒林传》序论。

⑲参见赵云旗:《隋文帝评价中的问题商榷》,《学术月刊》1991年第4期。

[责任编辑:明秀丽]